

湖湘文史丛谈

【第二集】

○ 湖南省文史馆 组编

○ HUXIANG WENSHI CONGTAN

○ 湖南大学出版社

湖湘文史丛谈·第二集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长沙

目次

大融合中崛起的湖湘文化

- 湖湘文化的源流、特征和人才群体 郭辉东 (1)
- 论近代岳麓书院的爱国主义传统 郭仁成 (8)
- 刘蜕哲学思想试析 郭仁成 (26)
- “黄老”思想简说 余明光 (31)
- 周敦颐与汝城 王兴国 (38)
- 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对外开放精神 王兴国 (43)
- 李自成归宿研究 叶志芬 (50)
- 史家的误笔

- 谈王船山的《双鹤瑞舞赋》 谭承耕 (56)
- 王文清著述叙略 寻霖 (59)
- 左宗棠会见洪秀全的传说探疑 左景伊 (64)
- 从“三二九”到“八一九”

- 辛亥两役之比较 郭汉民 (70)
- 黄兴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萧致治 (76)
- 熊希龄的历史地位 周秋光 (84)
- 韩长耕学术论文读后感 傅白芦 (92)
- 试论我国传统诗词的色彩美 田翠竹 (96)
- 儒家气象吟客情怀

- 《天岳山馆诗存》序 李锐 (103)
- 记钱基博先生在国师教陶诗杜诗 曾仲珊 (107)
- 诗钟漫谈 吴容甫 (114)
- 诗钟小识 宗子威遗著 吴容甫整理 (119)
- 王昌龄与芙蓉楼 刘果毅 (126)
- 袁大胡子 黄粹涵 (133)
- 记祖父朱德裳 朱运 (136)
- 无私无畏
- 先祖父黄兴言行片断 黄曼西 (138)

话说杨度	杨第甫 (141)
唐群英	
——南社女社友之杰出者	胡遐之 (149)
教书匠·学者·教育家	
——回忆任凯南老师	黄粹涵 (153)
王季范先生传略	易祖洛 (157)
毛泽东与韶山籍湖南文史馆馆员的交往	唐振南 (159)
杨遇夫与张舜徽的交谊	张君和 (164)
忆程潜与陈明仁	程杰 (169)
唐醉石	
——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	美·唐达康 (173)
陈寅恪先生的家世与湖南	张志浩 (178)
杰出的女教育家曾宝荪	吴为廉 (186)
倾洋涤宇宙 重建此乾坤	
——回忆先父罗学瓚烈士	罗立洲 (188)
风云变幻见忠心	廖汉生 (194)
柳森严的暴发与覆灭	刘乐扬 (199)
忆我的公公周谷城老人	徐克璜 (207)
先师马宗霍先生二三佚事	胡渐逵 (209)
缅怀先父吕振羽先生	吕坚 (212)
深切怀念五叔钱歌川教授	美·钱去非 (216)
忆沈从文师	谭蔚 (219)
笔挟风霜的严怪愚	周艾从 (223)
忆故友罗昶岚教授	美·柳无忌 (226)
娃娃教授	
——鲁实先	萧重周 (229)
林增平教授的人品和学品	杨慎之 (232)
周光召	
——一位核子能的先锋	汤毅强译 (242)
国师硕彦录	伍大希 (246)
湖湘历代科技成果举例	刘旭 (251)
湖南书法篆刻源流史略	陈琢 (257)
苏东坡佚文的发现与考证	
——浏阳谢氏族谱钩沉	谢文耀 (264)

古夜郎故乡

- 且兰与牂牁考 弘 征 (268)
- 女书及其文字源流探讨 周硕沂 (271)
- 湖湘数学著述钩沉 许 康 (275)
- 魏源故居探访记 汤策程 (280)
- 科举时代的湖南状元 王启初 (284)
- 清末湘学数则 张舜徽 (287)
- 梁启超题“时务学堂故址”始末 陈先枢 (294)
- 湘剧在长沙最早的戏班子和戏园子 黄曾甫 (296)
- “缙书”：得而复失的国宝 金 式 (298)
- 凤凰南长城考 向宽良 (304)
- 长沙师范学校创始考辨 张 兴 (308)
- 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始末 邓晏如 (311)
- 沅陵《力报》杂忆 冯英子 (317)
- 长沙黄氏音乐世家简记 朱立奇 (321)
- 戡子桥二号沧桑史 魏 方 (327)
- 望麓园的楼阁 孙 燕 (331)
- 修承浩与民国《沅陵县志》 刘国强 (334)
- 《新圆圆曲》(有序) 伏嘉谟 (336)
- 《宁乡县志》序 周光召 (339)
- 《晚晴诗文集》序 汤可敬 (341)
- 左宗棠轶事二则 廖楚强 (343)
- 闲堂自述 程千帆 (345)
- 叶德辉《光复坡子街地名记》补注 程千帆 杨翊强 (351)
- 叶德辉其人其事 颜震潮 (359)
- 张学良与文明书院 谭金刚 (362)
- 章士钊填词赞拉琴 唐泽明 (364)
- 彭德怀湘潭农村调查纪实 龙正才 (366)
- 李立三回乡探亲纪实 廖新民 (374)
- 周小舟对湘乡“世界最大标语”的严厉批评 刘秉勋 (379)
- 翦伯赞在香港 岑生平 (384)
- 廖沫沙与花边文学 唐正芒 (388)
- 我和沈醉 刘俊德口述 周保林整理 (391)

幸留遗照识亲娘

——记母亲胡筠烈士	李荣光 (393)
湖南省立一中杂忆	李荣光 (399)
中药店称“堂”起源于长沙	刘名果 (402)
从《铜官感旧图》题记看曾国藩的投水	石 沉 (403)
欢迎您到苗家做客	袁 桂 (405)
八指头陀诗翰	王启初 (408)
湖南竞技体育的一则往事	伏笑雨 (411)

大融合中崛起的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源流、特征和人才群体

郭辉东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结构上看，它具有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三个层次。精神层面包括政治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士习民风等等。区域文化是特定地理背景下，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湖湘文化作为湖南这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经过一代代湖湘士子的呼唤风雷和一阵阵中外思潮的汇合激荡，汇纳群流，融合中西，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传统和风格。本文着重从精神层面回顾湖湘文化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西方文化的四次大融合的历史行程，追溯湖湘文化的源流、特征和人才群体。

一、南宋时期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古代湖湘文化：源于湖南道县人周敦颐与河南洛阳人程氏兄弟，福建崇安人胡安国父子在衡山开其端，四川广汉人张栻在长沙兴学建学术基地，与江西婺源人朱熹在福建创立的闽学同出一门

中国内部文化的流向，宋代为止是自西北向东南，近代是自东南向西北。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之一，儒学、道学和中国化了的佛学均趋日盛，也是封建国家中央专制主义达到更加完善、巩固的时期。这个时期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湖南道县人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继承发展了孔子、孟子、董仲舒和韩愈以及佛学、道学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创立濂溪学，成为宋明理学的创始人。河南洛阳人程颢、程颐兄弟（生卒年限分别为公元1032—1085年、1033—1107年），同受业于周敦颐，并为理学奠基人。

湖湘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有胡安国、胡宏和张栻。福建崇安人胡安国，是二程的弟子，自称“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并同程门四大弟子中的谢良佐、杨时、游酢有密切的学术交往。建元之乱后，胡安国与其季子胡宏由湖北

迁入湖南，避居在衡山一带，著书立说，创建碧泉书院和文定学堂，聚徒讲学，为湖湘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胡安国的儿子胡寅、胡宁、胡宏都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尤以胡宏（公元1106—1161年，号五峰）功绩为巨。全祖望在《五峰学案》序录中认为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胡氏之学由胡宏的得意高足张栻传到长沙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使发源于衡山的湖湘学派重心转移到长沙，岳麓书院逐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四川广汉人张栻（公元1133—1180年，号南轩）是南宋中兴贤相张浚的长子，1161年随父到长沙并定居城南。他奉父命前往衡山拜胡宏为师，从学10年，除继承胡氏之学外，还广泛吸取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的学术思想，使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初具系统性。

在福建，二程思想经杨时、罗从彦、李侗，四传至朱熹，朱熹14岁时父亲病逝，朱松临死时把儿子托付给胡宪、刘勉之等人帮助教养。胡宪是胡安国的侄儿，早年从胡安国学周程之学，朱熹师事最久的是胡宪，共有10多年时间。朱熹以儒学为主体而融合佛道，特别是继承了周程的理学思想，把自然、社会、人生、思维等方面的问题熔于一炉，综罗百代，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创立程朱理学，或称朱子学、闽学。

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在《真文忠公读书记》中曾说过：二程之学，杨时得之而南传之罗从彦，罗氏传之李侗，李氏传之朱熹，此一派也。谢良佐传之胡安国，胡氏传其子五峰（胡宏），五峰传之张栻，此又一派也。

1167年8月，朱熹行程三千里，抵达岳麓书院访问张栻，在湖南停留两个月，朱张会讲被学术史传为佳话。张栻英年早逝后，湖湘学子又多从学于朱熹。1194年，朱熹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再次到长沙，此行影响最大的事是重建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经朱熹重建，发展甚快，学子达千人之众，在教育和学术上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此外，朱熹还同湖南九所书院有关系，对湖湘弟子产生过影响。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最早称胡张一派为“湖湘学”和“湖湘学者”。朱熹编著的《伊洛渊源录》按地域区分的九大学派中，胡安国的湖南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江西学、吕祖谦等的浙学，具有渊源关系或有直接的学术交流。正因为湖湘学（亦称湖南学）能博采众长，所以宋代开始就在各省区中跃居先进行列。

湖湘学派从宋末到清代道光时期，经历了由兴而不旺再到引人注目的转变过程。经过“两起两落”的流变后，明末清初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又一次“兼容并包，融会贯通”，使之从而发展成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把湖湘学派推向新的阶段。后又经陶澍、魏源、汤鹏、曾国藩等人的阐发，重新发扬

光大。

二、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三次大融合，使湖湘文化更具生机与活力，亦使湖南从“碌碌无所轻重”的闭塞地区渐次变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显赫省份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经历过三次交汇与融合。先是知器械不足，搞了洋务运动；再是知政治体制不足，搞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接着是知思想文化不足，搞了新文化运动。近代以来，“湘省士风，云兴雷奋”，最早办洋务且成效较大的是湖南人，倡导变法并身体力行的是湖南人，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也有一大批湖南人。在近代以来的三次中西文化大融合中，湖湘文化一次次吸收着新鲜的养分。湖南也三次出现了人才群起的局面，由“碌碌无所轻重”成为近代史上对中国全局影响至深至巨的地区。

（一）洋务运动时期的近代第一次中西文化大融合，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

鸦片战争是东方刀矛与西洋炮舰的拼杀，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了中国人的第一次大反省，导致了洋务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大融合。湖南人既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洋务运动的最早实行者，加上太平天国运动和湘军的勃兴，湖南人大批地走出了湖南，并带头走向世界，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派文化和西方文化，对湖湘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

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汤鹏、邓显鹤等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先驱，致力于探索拯救社会的道理，大力倡言并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提出了开言路、广贤路和整治河政、漕政、盐政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由陶澍、魏源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为特征的近代湖湘学风，已基本成为湖南士人的一种学术传统和风格。

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湖南邵阳人）以超迈前古的恢弘气魄，在《海国图志》中首倡会通中西，预言“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把人们从闭塞的狭小天地引入各放异彩的多元世界。

洋务运动创始人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提出“师夷智以制炮制船”的建议和比较全面、完整地表达洋务派观点的思想政治路线，发动一场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造轮船、制机器、开矿山、建译书局、办新式学堂、选派幼童留学等，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学习西方的窗口。有绝世奇才之誉的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创建了当时全国最大

的企业——福州船政局，并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军官。

出使过英法等国的我国第一个驻外使节郭嵩焘（湖南湘阴人），眼界看得更为高远，他主张把学习西方的重点摆到政教制度方面。出使过英法俄的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广泛留意当地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问题，直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寻求富国强民之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先导作用。

湖南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又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沿海地区很少往来，在古代历史上很少有闻名全国的人物。鸦片战争前后，这种面貌开始改观了。湖南地处贯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从而成为新旧思想撞击、中西文化融会的场所，也为湖南人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条件。湖南人开始成批地走出湖南，对于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是成批的湖南士子经过科举的道路步入仕途，并与京城和江浙等沿海地区风雅之士建立了较为广泛的联系。当时湖南人要想出头，只有中举人、考进士、点翰林这一条路。道光年间，湖南文风大盛，考中进士的人逐渐增多，湖南名人开始成批地出现。可以称得上楚材之盛第一人的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安化人），以其特殊的经历和才学，在湘籍人士与全国，特别是与沿海地区人士的联系中起到了一般人所起不到的桥梁作用。二是大批加入太平军，为湖南人大批走出湖南提供了条件。太平军 1852 年在湖南转战半年，从南到北攻克 20 多个州县，兵力由入湘时不足万人，发展到出湘时 15 万人。三是湘军的兴起，为湖南人登上军事政治舞台提供了空前的机会。为镇压太平天国，湘军走出湖南征战 12 年，湘军集团一跃成为清王朝的主要支柱和最大的实权派，致使当时出现了湖湘弟子满天下、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据罗尔纲对湘军人物 182 人的考查，在各级实授官职的将官中，官至总督 13 人，巡抚 13 人，其他文职在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在提督上下的有 143 人。另据有关资料表明，仅在湘军 12 年征战中保举三品以上的文职官员就达一万余人，他们散布于朝廷内外各级政权之中，成为颇有势力的政治力量。

（二）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近代第二次中西文化大融合，导致湖南人才开始进入世界文化的网络

甲午中日之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表明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中国变得富强，应致力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各项制度的更新。甲午战争的失败引起了中国人的第二次大反省，泱泱大国居然败于“弹丸之地”的小国，令不甘屈辱的中国人大为震惊。特别是湘军在辽东与日军三战皆败，迫使他们开始探索拯救湖南进而拯救中国的途径。湖南的维新派诸人，莫不是从此而觉醒奋起，导演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维新壮剧。戊戌变法兴起后，经过

谭嗣同、唐才常（均湖南浏阳人）等维新志士的努力，原来被反动派看成“安静世界”的湖南，成了“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连当时的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徐仁铸等地方官吏，都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任用维新志士办新政、开学会、兴学校、办报纸。曾经说过“湖南以守旧闻天下”的梁启超，这时赞扬湖南“全省风气大开”。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社会思潮由改良转向革命，孙中山成了20世纪初期探索中国走民主之路的先行者。辛亥革命时期，湖南是重要的革命基地之一。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继起响应者首推黄兴和他在内地最早组织的华兴会。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领衔组成同盟会，参加7月30日筹备会的共79人，其中湖南籍20人。同盟会最初两年会员为976人，湖南籍158人，在各省中排列第一。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总司令和代总司令是湖南的黄兴和蒋翊武。武昌起义胜利以后的12天，湖南成为“首义之省”。

值得注意的是，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是湖南人才开始进入世界文化网络的时期，湖南人的足迹遍及日本和欧美各国，对于吸纳世界各国文化精华，丰富湖湘文化的内涵，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湖南人走向世界数量之多、进出之频繁，不仅为史所罕见，而且成为各省之冠。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2395人，湘籍学生即达373人。据查证，黄兴、陈天华、宋教仁、杨树达、谭人凤、禹之谟、范源濂、蔡锷、章士钊、杨度、李达、林伯渠等人，都先后到日本或留过学或避过难或学过工。杨昌济1903至1913年曾在日本、英国、德国留学9年，我国第一个女教授陈衡哲是1914年官费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近代妇女活动家张默君1918年曾遍历欧美各国考察。从1919年到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者约1600人，湖南达346人，是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徐特立、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向警予、李富春、蔡畅、何长工等人，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参加者或组织者。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介绍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进步青年赴俄学习。

（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近代以来第三次中西文化大融合，湖湘文化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毛泽东等一大批湖南巨子的崛起，改写了“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的历史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近代中西文化的第三次冲突与融合已从制度层面进入精神层面。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进行了第三次大反省，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最沉痛的检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不适应时代潮流的旧教育、旧文艺、旧道德、旧传统进行最猛烈的冲击；另一方面高扬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中心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

实践。

五四运动的洗礼，使闭锁的洞庭湖闸门开动了，浩浩荡荡的中外新思潮涌进了湖南，马列主义磅礴于湘江两岸，连罗素、杜威、张东荪、吴稚晖等人也先后来湘贩卖反马列主义的货色。在如潮水般涌进的中外思想文化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革命先驱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抉择，选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把新文化运动的工作重点由思想启蒙转移到造就一代新人和直接的政治运动。此后，在湖南发展起来的湖湘文化，其作用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湖南的范围。特别是在文化和道路的选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19世纪人类最高成就的马克思主义选作指导思想，并选择了“仿效列宁”从根本上进行“再造”的俄国式革命道路，这与洪秀全、严复、康有为、孙中山这些向西方学习的先驱相比，在文化选择上具有更高的理论视野，在道路选择上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成功地利用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创立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毛泽东思想，并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了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在血与火的考验和锤炼中，湖南的英烈屡仆屡起，涌现了大批党政军杰出人物。在中国共产党495名党史人物中，湖南籍89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10人；在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54名中将以上的将帅中，湖南籍73人。在政治、思想、军事和其他领域中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20世纪的帷幕将徐徐降落，新世纪的曙光已照临人类的窗口。在世纪之交和千年更迭的光辉里程碑前，人类已处在新的转折点上，东西方文化都面临着新的抉择。

一些西方学者曾经预言：在全球形式的未来世界中，文化将从西方转向东方，“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时代”。早在1974年，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汤因比就断言：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人类的希望。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未来的世界是充满竞争的世纪，天边的飓风和海啸正向我们狂奔而来，我们的航程不会一帆风顺。我们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机遇，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将有一场场大的搏斗。从最坏处设想，从最好处努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过去已不复存在，未来即将降临。追昔抚今，放眼未来。我们既不能为湖湘文化曾有的辉煌而盲目陶醉，也不必为湖湘文化出现的衰微而过度忧虑，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中，只要我们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大胆吸纳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根除自傲与自卑的双重心理定势，正确选定整体文化的发展目标，构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式，以超迈前古的大度，引进竞争和效率观念、求新求异观念、开拓创新观念，同时又以宽容与友好的心态去发掘人的潜能，而且保持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湖湘文化必然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湖南人才必然会再度群起，湖南将再度辉煌。

论近代岳麓书院的爱国主义传统

郭仁成

(一)

岳麓书院师生上承楚诗人屈原的余绪，经历南宋年间与金元诸外族连绵不断的战争洗礼，积累了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千年来涌现出一个个堪称民族精英的人才群体。在古代，头一个是以吴猎为代表的力抗金元的“岳麓诸儒”，第二个则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明末遗民集团。进入近代，把岳麓书院的爱国主义传统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的是魏源。这里我们要论述的就是以魏源为代表的第三个群体以及以后的第四个、第五个群体，也就是近代岳麓书院的爱国主义传统。

王夫之生活在一个基本上封闭的环境里，感到切肤之痛的是故国沦亡，异族入主，所以他一生总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坚持反对清政府的统治。魏源则生活在一个落后的、却被迫洞开门户的老大帝国里，昔日互相斗争的国内各民族经过近 150 年的进一步融合，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而这个大的民族所面对的共同敌人，却是不但种族不同而且文化传统迥异的西方侵略者。因此，他认为，要想救亡图存，就必须把眼光从国内扩大到全世界，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引进先进的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目的。

魏源的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分界。前阶段着重在以其经世致用的实学致力于对内进行改革；后阶段则着重在对外学习西方，以达强国御侮的目的。当魏源出世的时候，清王朝已走完了它的黄金时代——康雍乾三朝，不但国内农民和少数民族的反抗运动连绵不断，而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来，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一年比一年紧迫，老大帝国积重难返的种种弊病也就一天比一天暴露得充分。而那些读书人则对即将袭来的暴风雨懵然不觉，或依旧拘囿于八股利禄之场，或一味埋头于考据训诂之学，大多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魏源前期的爱国思想，就是在这种内外交煎的环境中激励而成的，其“以经术为治术”的学风，发端

于刘逢禄的今文传授，受益于龚自珍的相互切磋，而其兴利除弊的经济之学，则大都出自他和岳麓师友的改革实践，也与岳麓书院的传统有关。魏源的叔父辅邦（《岳麓志》作宁邦）也曾肄业岳麓书院，受山长罗典“明习时务”思想的熏陶，《魏源师友记》称：“（默深）文章经济的有声名重华夷，多辅邦有以教之也。”

在魏源用世前后，岳麓学院师生已经形成了这个书院历史上的第三个人才群体，他们或为师或为友，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在国计民生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严如煜是这个群体的先驱。曾知汉中府十余年不调，《清史稿》称他“化榛莽为桑麻，此其功皆在一时节钺之上”。平生“研究舆图、兵法、星卜之书，尤留心兵事”。所到之处“于舆地险要，如聚米画沙，所规画常在数十年外”。他不是个经验主义者，凡起而行的都能坐而言，著书立说，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尝佐那彦成筹海寇，有《洋防备览》；佐姜晟筹苗疆，有《苗防备览》；佐傅鼐筹屯田，有《屯防书》。”（以上引语均见《清史稿》本传）他的独生子正基也以经济之学显名。严氏父子的经济之学对魏源影响甚大。如煜是前辈，魏源的父亲邦鲁“少时尝晤淑浦严如煜于京师，从受奇门六壬占筮，兼闻经世之学”（《宝庆府志》）。魏源早年得闻傅鼐治理苗疆的有用经验，又能亲炙袁名曜的经世之学，都由于严氏的推引。正基于魏源为岳麓同学，后来他们还同时参与过两江总督陆建瀛的幕府，他们的老师袁名曜虽然只做过编修、侍讲一类的官，无从施展其经世之才，但严如煜仍称他为“楚南第一流人物”，闻其掌教岳麓书院，不远数千里遣其子正其就学。陶澍也说他“才气纵横，不可一世”。他“遇事议论锋发”，“足迹遍天下，尤留心舆图、厄塞、河渠、险隘、古今沿革”。他这些有用之学使岳麓书院诸生眼界大开，思想也活跃起来，所以当他“每日暮出行讲院前，诸生环绕，名曜——指论瑕瑜”。（引语均见同治《宁乡县志》本传）即此可见，他对造就岳麓书院历史上第三大人才群体是作出过切实贡献的。

在这个爱国志士群体中，陶澍和贺长龄居于关键的地位，二人皆出身岳麓书院，与魏源志同道合，在改革种种弊政中做出了实绩，使魏源的经济之学一开始就具备明显的应用性。陶澍是一个著名的理财家、水利专家，在改革漕运、盐政诸方面具有超凡的魄力和出色的才干。《清史稿》称他“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魏源亦称他“力犯群忌，且事未尝不举”（《陶文毅公神道碑铭》）。贺长龄宣力中外四十年，勇于兴利除弊，守南昌时，设自理谘局，评定章程；布政江苏时，力主海运，并促其实现，及总督云贵，瞻仓储，种桑麻，僻远之区，民皆利赖。陶贺二人与林则徐都曾经是魏源父亲的上官，后来遂成通家之好，而魏源从事改革的政治生涯则是从26岁时进入贺长龄幕

府开始的。他们合作的第一大丰硕成果是《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和出版。道光五年（1825），贺长龄任江苏布政使，延魏源合选当代关系治道、切中时弊的论议文章为一编，以倡经世之学，为改革作舆论准备。次年，《皇朝经世文编》选入一千三百多篇。辑成一百二十卷。魏源在序言中提出他们经世济时的四项原则：“事必本乎心”，而“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法必本夫人”，而“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今必本夫古”，而“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物必本于我”，而“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这部书一问世，便如巨石击水，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后来俞樾称它：“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桀蓐，几于家有其书。”（《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序》）一时经世致用之学便蔚为风气。而以经世名编，仿其体例者前后竟达三四十种之多。

也就是贺魏合辑《皇朝经世文编》的时候，陶澍也调任江苏巡抚，他与魏源“亦以文章经济相莫逆，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魏府君事略》）。这期间，魏源写出了《筹漕编》，又代贺长龄作《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力主由海商运送漕粮以革除漕运的弊端。次年江苏试行海运成功，随即刊刻《江苏海运全案》，他在序言中说：“非海难人而人难海，非漕难人而人难漕，本是推之，万物可知也；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患，反是正之，百废可举也。”这些见解充分表现出一个改革者的勇气和信心。

魏源在陶澍幕府时，对水利建设也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首先根据自己早年对两湖地区河流湖泊的实地勘察，代陶澍作了《湖北堤防议》，后来又扩充为《湖广水利论》，提出要兴水利、除水弊，首先就要“除其夺水、夺利之人”，“不问其为官为私，而但问其垸之碍水不碍水”，凡是妨碍泄洪、蓄洪的垸子，都应坚决毁掉，以达到“毁一垸以保众垸，治一县以保众县”的目的。道光十三年（1833），他代陶澍为凌涑《东南七郡水利略》作序，则是他对江浙水利问题研究的成果。魏源与陶澍合作的改革项目中，盐政的改革最有成绩，他们坚持“便国便民”的原则，主张“尽收中饱、蠹蚀之权，使利出于一孔”，也就是使盐利尽归商民，国家则因此增加税收。当时，陶澍已升任两江总督，首先在淮北实行票盐法，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都可领票运销，把一切居中“仰食于弊之人”的特权通通革除。这就大大有利于促进商业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他先后写《筹鹺篇》和《淮北票盐志序》两篇专论，反映了他在盐法改革中所取得的先进经验。在鸦片战争前三年，魏源还辑有《明代食兵二政录》七十八卷，这是继《皇朝经世文编》之后又一经世致用文章的汇编，而他先后为此书写的两篇序言则对当时尚不为一般人所注意的弊政和失误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对于所看到的种种弊端，他几乎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而且大多能身体力行，为天下倡，这就是魏源前阶段爱国思想的鲜明

特色。

魏源后阶段的爱国思想之所以从国内改革转向学习西方，一方面是由于前阶段的改革实践使他坚信：“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默觚下·治篇》），这就是说，欲求祖国富强，必须在思想上打破时间和地域的界限，只要能富国利民，不管是什么时代什么国度的办法都可以用。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已经越来越觉察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跟过去大不相同了。“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商漕、病漕、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明代食兵二政录叙》）而当他协助陶澍、林则徐等更币禁烟，不但没有达到堵塞漏卮的预期目的，反而招致英国侵略者更加猖狂的进攻时，就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觅救亡图存的途径了。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爆发，魏源就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听到伊里布视师宁波，俘获英人安突德，就赶赴军中向安突德询问英国情况，写成《英吉利小记》。九月，积极反侵略的林则徐被诬革职，清廷改派琦善到广东“议抚”，魏源愤而赋《寰海》，对清廷“不诛夏谗惩贪帅，枉罢朱纨谢岛夷”的错误决策深表不满。第二年春，裕谦奉旨筹办浙江防务，林则徐亦受命协防，魏源又应邀入裕谦幕府，积极参加反侵略战争。但实际情况使他很失望，数月便不得不辞归。到了五月，林则徐终于与邓廷桢一道，被充军伊犁。魏源与林则徐在京口晤别，林嘱他撰《海国图志》。从此他满怀御侮雪耻之志，却又手无斧柯，报国无门，只得退而挥笔著书来唤起国人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而结束，魏源撰成了十四卷的《圣武记》。这本书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回顾了清初以来奠定祖国疆域的武功，首先是为了激励广大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振奋士气，以抵御外侮，同时也是为了鞭挞那些在入侵者面前前倨后恭的妥协投降派，他反复告诫统治者：“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赢，令不行于境内之谓赢。”他引《礼记》的话勉励大家：“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这些都是他热爱祖国的真挚感情的流露。与《圣武记》问世的同时，魏源还是第一个撰成了鸦片战争史《道光洋艘征抚记》的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的失利，关键在于：“粤东不议守而专款，是浪款也；奕山不筹守而即战，是浪战也；颜伯焘、裕谦、牛鉴不择地而守，是浪守也。”也就是撰成《圣武记》的同一年年底，魏源又辑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后来陆续增补至一百卷，这是他后阶段最重要的代表作，书中所包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世影响也最为深远。他在序言中首先说明编这部书是他和林则徐共同的意愿：“《海国图志》五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